

“大智慧”学术文丛(第2辑)
DAZHIHUIXUESHUWENCONG



国民参政会 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GUOMINCANZHENGHUI
YUKANGRIMINZUTONGYIZHANXIAN

王 丰 著

华文出版社

国民参政会 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 丰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丰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5
(“大智慧”学术文丛·第2辑/李正堂主编)

ISBN 978 - 7 - 5075 - 2344 - 7

I . 国… II . 王… III. ①参政会(国民党政府)—研究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 IV. D693.22 K265.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215 号

书 名: 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75 - 2344 - 7

作 者: 王 丰

责任编辑: 李惠玲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 - 58336255 发行部 010 - 58336270

编辑部 010 - 58336222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1168 × 850 1/32 开本 7.8 印张 23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是国共二次合作的产物，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章。它的成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抗战的进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政治愿望，起到了团结全国各界力量共同抗战的作用。目前，有关国民参政会的文章、著述很多。但是，把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关系联系起来，专门系统的论述国民参政会在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演变过程的论著还不多见。正是在这个视角下，作者撰写了《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书，弥补了这个缺憾。

我认为，《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书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从动态的视角研究国民参政会这一历史现象，展现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涉及的内容范围广。作者首先从动态的视角分析了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准民意机关，一方面它由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和无党派的社会贤达组成；另一方面它的成员在会内的言论和行动大都能反映各地区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尽管国民参政会不能同民众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相比，但它在反映民众的抗战意愿和要求上确实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就凸显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变化。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全书主题鲜明，融会贯通，既有深重的历史感又有明显的现实启发性，表现出作者较强的驾驭资料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二是立意新颖，提出了一些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观点。国民参

政会和国共两党是两个常规论题，作者把二者联系起来却形成了新的研究视角，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个人见解。例如，在第二章，通过研究国民参政会的缘起及成立、性质和历史作用，提出从动态的视角观察国民参政会，不能采取孤立静止的观点，单纯的把它定性为民意机构或咨询机构，揭示了国民参政会性质的变化同抗战局势和国共关系演变的内在联系。在第五章，通过分析国民参政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和国共关系的反复变化，提出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直接决定了国民参政会性质的演变。作者认为国共合作时，国民参政会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共分裂时，国民党控制国民参政会，压制民主，推行独裁，阻碍了民主发展进程。所以，国民参政会与国共关系是一个同向的演变过程。书中这样的一些观点虽然还可以再进一步探讨，但却丰富了党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对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是有益的。

三是研究方法有特色。作者在研究中采取动态立论的方法，没有把国民参政会从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孤立出来，既阐述了受抗战影响的国共关系对其性质变化的决定作用，又论证了国民参政会对国共关系发展的反作用。从而很自然地说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抗日战争的必然产物，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成立从一定程度上为国共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国共关系的维系提供了舆论平台。因此，我认为这种动态评述历史、全方位看待问题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作者是位有造诣的学者，他在承担着教学任务的同时，能认真研读各种有关资料，大胆创新，以自己的辛勤汗水完成了这部具有史料价值的专著，我很为他高兴。故欣然提笔，以成此序。

沈 津

2007年5月于焦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抗日战争的爆发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25
第一节 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国共关系	25
一、“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内政局	25
二、从“一二·九”到“西安事变”国共关系出现转机	27
三、为抗日图存国共秘密谈判	32
第二节 全民族全面抗战的热潮	35
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35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中国国民党的 《抗战建国纲领》	37
三、人民的战争	40
第二章 国民参政会的若干问题	43
第一节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	43
一、国防参议会的设立	43
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 参政会案》	46
三、《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和《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	51
第二节 各界人士对国民参政会成立的期待	54
一、毛泽东等应邀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54

二、社会各界欢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	56
三、国民参政会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58
第三节 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59
一、国民参政会的性质	59
二、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63
第三章 初期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关系	69
第一节 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	69
一、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69
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76
三、《抗战建国纲领》与各种民主提案的团结作用	80
第二节 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	83
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和国民参政会重庆时期的开始	83
二、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二次会议	86
三、参政会上斗争的开始	94
四、共产党依托国民参政会推动反奸斗争和宪政运动	100
第三节 投降与专制阴云笼罩下的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	103
一、汪精卫投敌与国民党策划反共	103
二、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三次会议	107
第四节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	125
一、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三大口号	125
二、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	129
第五节 国共摩擦与反摩擦公开化的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	143
一、日蒋汪的反共、“和平”攻势	143
二、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	146
第六节 对初期国民参政会的评价	154
一、初期国民参政会的性质	155

二、初期国民参政会的作用	156
三、初期国民参政会的不足	157
第四章 中期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关系	162
第一节 “皖南事变”与二届一次参政会	162
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及对参政会的影响	162
二、“皖南事变”和中共的斗争方针	165
三、共产党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	173
第二节 国共关系缓和 共产党出席二届二次和三届一次参政会	184
一、“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	184
二、共产党出席二届二次和三届一次参政会	194
第三节 国民党利用参政会反共 共产党参政员退席抗议	198
一、国民党利用三届二次参政反共	198
二、共产党参政员退席抗议	203
第四节 国共谈判与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	209
一、国共谈判内容首次在参政会上公开	209
二、共产党在参政会上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216
第五节 对中期国民参政会的评价	221
一、国民参政会性质的转变	221
二、国民参政会的积极因素	222
三、国民参政会的消极作用	224
第五章 后期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关系	228
第一节 国民参政会走向灭亡	228
一、国民党继续保留国民参政会	228
二、国共两党在参政会上的最后分裂	231

三、参政会变成了国民党的御用工具	239
第二节 “破车不能再开”——参政会的破产	245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245
二、参政会的收场	252
第三节 对后期国民参政会的评价	258
一、国民参政会是蒋介石独裁的御用工具	259
二、国民参政会与国共关系的同向演变	260
三、国民参政会退出政坛的历史必然	262
第六章 研究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关系的 几点思考	266
一、坚持民主执政，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266
二、坚持平等原则，发展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	275
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正确解决台湾问题	280
四、坚持工作方法的与时俱进，正确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286
主要参考文献	294
后记	297

绪 论

1945年9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更是百余年来中国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存在及其演变在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在武汉成立，同年迁到重庆，1946年迁回南京，1948年3月结束。总共开过4届13次会议。随后，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重新发动内战，国民参政会被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走向独立、民主、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解放洪流所淹没。

国民参政会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抗战史、国共党史、统一战线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国民参政会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它适应了全中国人民渴望实行政治民主，实现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要求。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弱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持久抗战，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改革政治机构争取政治民主，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当局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内继续实行法西斯专政，压制抗日民主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明确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

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构。1936年8月又致书国民党，进一步郑重宣言，中国共产党“赞成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①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再次要求“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宋庆龄、何香凝等也提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呼吁国共合作，促使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七七事变”以后，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参加争取政治民主，实现全面抗战的不懈努力中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国民党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阶级之间的争执也就让位于民族利益的保卫。这就使得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都站在了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行全民族抗战。而“九·一八”以后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摒弃前嫌，团结一致，才能赢得这场战争。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实现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的外部条件。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但因共产党力量的弱小和缺乏国际力量的支持，因此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所以只能争取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来保证国共合作的进行。执政的国民党既然要合作，在政治民主问题上就不能不有所表示，提出了“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在国内政治方面，就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实行有限度的政治民主，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政”。因此，国民党政府在积极组织正面对日作战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政治改革。1937年8月，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该会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乡建派领袖和教育、外交、军

事等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国民党元老代表为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也是后来国民参政会的基础。这是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之一。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进步，中国共产党表示赞扬和欢迎，但也希望国民党的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②同时，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也作了重要调整，1937年底，提出了“巩固国共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口号，将过去以不承认国民党政权为前提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召开国防会议”、“组织国防政府”的政策，改为“充实和加强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即首先承认由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各抗日党派团体代表参加政府工作，使之“充实和加强”。^③根据这个精神，1938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中共认为，这个机关的组织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其他形式均无不可”，关键是要包括各抗日党派、军队、团体的代表，拥有对政府的建议、咨询，以及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同时共产党希望这个民意机关能成为进一步争取政治民主的阵地，成为在国共合作缺乏组织形式的情况下，维护国共团结，保证合作顺利进行的类似机构。^④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和“建立民意机关”主张的提出，表明了他们的合作诚意，对于巩固国共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和国际舆论，防止日寇离间，克服投降情绪，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临全大会上，国民党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也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团结，寻求各界支持，因此，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⑤国民党随后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

国民参政员。国民党认为，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不再是国防参议会一类的咨询机关，而已成为“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之代表机关”。^⑥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到，这个机关和共产党的要求相距甚远。首先，在人员组成上，国民党规定参政会由各省市、蒙藏、华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代表四部分人组成。^⑦尽管它包括了共产党、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会、乡建派等中国主要抗日党派的领袖，但却不允许他们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参加，而只能以地区或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出现。同时，要求他们在会上“不发高论，不出难题”，以“服从多数，抛弃成见”。这实质上是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⑧其次，参政会由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占了大多数席位。在第一届200名参政员中，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其中相当部分倾向国民党)各89人，分别占44.5%；其他5个抗日党派22人，仅占11%(共产党7人、青年党7人、国社党6人、社民党1人、第三党1人)。越到后来，国民党员越多，到第四届时，竟高达84%。第三，参政员均由国民党中央遴选，尽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能完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第四，参政会职权有限。它名义上拥有对政府施政方针的议决权，听取政府报告及询问、提案权，以及后来增加的政府交办事项调查权、初审国家总预算审议权。但是，它的所有决议，都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批准后，才能交由有关部门实行。因此，参政会的决议对政府没有多少约束力。显然，这样的组织根本算不得“民意机关”，只能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咨询机关”。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毕竟是国民党在经历了10年法西斯统治以后，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是抗战初期中国政局上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它显示了中国各阶级、党派、团体、军队和人民大众的团结，第一次为各主要

抗日力量共同参与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场所。特别是允许共产党从偏僻的陕北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第一次站在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发表抗日主张，这将极大地提高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扩大其影响。国民参政会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因此，共产党认为，国民党临全大会的基本精神是坚持抗战直到胜利，与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基本一致。因此，决定采取“主动的积极拥护并促其具体实施”的方针，“以充实与发展”其不足，对其中的错误，只给予“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⑨本着这个精神，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接受国民政府的聘请，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共7名参政员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参政会是“我国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是“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尽管它不能尽如人意，但可以发挥“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成为“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除继续努力争取建立一个“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真诚地希望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参政员“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抗战建国大计，以达到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文明的新国家的目标。^⑩

中间势力认为，国民参政会是“民主政治的发端”，希望以参政的“议场”来代替内战的“疆场”，用表决的“系数”来代替作战的“炮杆”，解决国共争端。^⑪国际进步舆论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前苏联《真理报》认为，参政会成立表明中国“联合反日统一战线之伟大力量已形成”。^⑫一些国际援华组织、华侨团体

也纷纷致电大会，表示祝贺。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正式成立。

在国民参政会初期(1938年7月~1940年4月，第一届会议期间)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中的大多数都积极热情地为抗战献计献策。国民参政会发挥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参政会内部出现了摩擦和分裂的端倪。1938年7月6日，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时值日军占领南京，直扑武汉之时，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迫切要求国民参政会巩固与加强全民族的团结，而日寇、汉奸则“预言”国共两党在参政会中一定分裂，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部分动摇和离心的倾向。因此，毛泽东指出，参政会应该肩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重任。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统一战线的抗日救国纲领和组织形式，这不利于全民族抗战。当时，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大党和执政党，领导着全国的抗日战争，其《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精神与中共抗日纲领一致，为全国人民所拥护。而抗战初期，刚刚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战略大转移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积蓄力量，重新发展的阶段。根据对国民党抗战纲领“主动积极拥护，促其具体实施”的方针，除毛泽东外，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都前往武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由陈绍禹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同时，希望国民政府尽快根据该纲领制定具体详明的实施办法。由于这一提案充分表示了中共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抗战的诚意，反映了绝大多数参政员的心声，因此刚一提出，就有67位各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联署”，成为

这次会议中联署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此外，郑震宇、王家桢也提出了类似的提案。在讨论时，中共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蒙古新羽及各其他党派、地区的代表等相继发言，真诚拥护，爱国情绪热烈高涨。最后，全体参政员起立鼓掌通过，“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大会决议：“惟有精诚团结，艰苦奋斗，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始能免沦于奴隶灭亡之境，而跻身于自由平等之域……切望国民政府制定实施办法，督促各级政府，切实行”，“以取得抗战最后之胜利，而达到建国之成功”。中共和其他党派参政员还提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提案，以补充和完善《抗战建国纲领》。

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一届一次参政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第一次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地各界代表于一堂，充分显示了全民族的大团结，再次确定了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国策，回击了日寇汉奸的挑拨和破坏，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赞扬。一届一次会议结束后，参政会迁往重庆。当时，武汉失守，已成定局，人心本已浮动。而身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则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年内战的深刻教训和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长期合作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应该看到，“蒋委员长的抗战是坚决的”。我们既要“反对一切和平妥协的活动”，又要“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⑩这是一个问题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为此，毛泽东同志致电汪精卫，指出，当全面抗战面临严重关头的时候，除继续“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特别要坚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⑪这实际上是批评汪精卫的妥协活动，告诫他

不要破坏全国上下精诚团结的抗战局面。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也赶往重庆出席10月28日召开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拟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提案痛斥了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谰言，重申“蒋委员长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国民政府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我全国军民一致信任和拥护”。该案引起了强烈反映，有67人联署，占出席人数的55.3%，创国民参政会历史上提案联署为数最高记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先生由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摄以汉奸国贼论”，直斥汪精卫投降要害。与此同时，国民党和无党派参政员也提出了拥护蒋介石，痛斥“议和空气”的提案。尽管汪精卫唆使党羽反对这些提案，并企图掀起“和战”问题讨论，但大会排除了汪派分子的干扰，通过了《拥护蒋委员长决议案》，这些提案和决议案，一扫汪派制造的乌烟瘴气，全国军民为之振奋。

一届二次参政会闭幕不久，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公开叛国投敌了。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要求参政会通过讨伐决议。一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林祖涵等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在一届四次会议前夕，毛泽东等向大会提出，“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是当前中国政治的第一要务。董必武等在会上提出了《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一届三、四、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声讨汪逆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表示了参政会“一致斥伐，以昭大义”的严